

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 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

关佳宁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安全困境的产生看法基本相同。分歧在于这种困境是物质现象还是思维现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是它们理论共同的逻辑起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就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也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安全困境”, 主体行为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主体行为均取决于主体间“互动—认知”程度。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把“安全困境”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固有特征, 必然会得出“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国际结构是通过主体间行为和认知的互动而架构起来的论断, 给“安全困境”的超越带来了可能, 但其主观性太浓而趋于理想化。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 要求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 认同等观念因素的影响是为其为基础的。

关键词: 安全困境; 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4-0372-07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 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1](9)}笔者认为, 在对“安全困境”的研究分析中仅运用单一研究范式是无法对其作出圆满解释的。所以不揣冒昧, 结合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多种范式, 对“安全困境”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试图能在此基础上构想“安全困境”逃逸的模式。

一、关于“安全困境”产生的理论之差异比较

“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 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2](6)}。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 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3](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4]

(John Herz)。巴特菲尔德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 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3](29)}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 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他先是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 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兹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社会情势(或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 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 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 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 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 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

收稿日期: 2007-04-25

作者简介: 关佳宁(1982-), 女, 吉林省吉林人,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亚太问题。

的。”^{[5](231)}赫兹也把“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看作是一个“悲剧”。他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5](241)}

“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霍布斯哲学中充满悲观色彩的“自然状态”理念。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受自我保全或自我安全冲动的主使，人人都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又都欲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于是就发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每个人都会杀每个人的困境，人类结合成若干个服从于中央权力的社会，即国家或“利维坦”这一凡间的神来维持秩序。然而，由人类建立起来的国家之间则依然因为没有更高的权威而继续处于“自然状态”之中。虽然，根据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的研究，霍布斯认为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不会经常导致那种与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相伴随的苦难^{[6](36)}，但是，即便如此，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依然会促使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即某一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会不自觉地导致降低他国安全，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竭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至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中。

通过对“安全困境”命题提出和发展的过程的分析，国际关系学者阿兰·克林斯总结出安全困境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意图的善性，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吊诡(结果与目的适得其反)。并认为陷入安全困境的各方的意图是否是善意的决定一种困境是否是安全困境，而对对方行为意图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安全困境的核心要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安全困境”理论得到不同的理论学派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发展。美国国际政治学的新现实主义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代表人物肯尼迪·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自希腊的修昔底德和印度的考蒂利亚时起，武力的使用以及控制武力的可能性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着重研究的对象。约翰·赫兹新创了‘安全困境’一词以描述这种状态。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7](225)}沃尔兹进一步认为，各国实际上无法摆脱这一困境，但是多少还能易于应付。因为明智的政治家只寻求适当的，能保证国家安全的权力总量，并且国家均衡权力

而不是最大化权力。国家几乎很少将权力最大化当作自己的目的^{[8](40)}。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也将源自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安全困境”概念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原因在于与国际政治理论中经典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安全困境”概念的基础则在于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强调。堪称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认为：“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势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9](23)}很明显，在对“安全困境”的定义及理解上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9](23)}

而作为一支与“两新”并驾齐驱的年轻的力量，建构主义则对“安全困境”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对于安全困境的情势，它与“两新”的看法基本相同，都认为它是一种一方增强实力给另一方带来威胁感，而另一方以增强实力作为回应而形成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但对于安全困境的产生，则认为“安全困境”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把“安全困境”界定为一种思维上的产物，一种在认知上把它者界定为或敌或友，从而根据这种身份确定彼此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情境。这也就决定了行动者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行动者的主体间性，从而改变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使行为体的行为从安全困境中摆脱出来，建立起安全共同体。

比较而言，三者在“安全困境”的情势上基本达成共识。三者最大的分歧在于这种困境是物质现象还是思维现象。“两新”直接从现实出发，认为“安全困境”就是国家以武力、权力等作为手段而获取安全利益形成的状态，最后又回到现实中去，似乎更具说服力。而建构主义在“安全困境”的界定上，把不可回避的物质因素放在了第二位，而把观念因素放在第一位。也可能正是如此，才提供了别样的行为选择。

从三者对“安全困境”概念的不同理解上不难看出

出,“无政府状态”是三种理论范式产生不同视角的根源。无论是注重物质力量,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先验而又不变的结构因素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强调文化观念和规范,以演进眼界看待“无政府社会”的建构主义,都无法回避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因为这是它们各自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正是它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较大差异,导致它们相应不同的逻辑推演和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不同解读。

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安全困境”的逻辑起点——无政府状态之理解差异比较

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他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他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与国内政治体系的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特征相比,国际政治体系是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因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经久未变。他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指在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缺少法律实施和秩序,而不是指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如果把无政府状态等同于混乱、破坏和死亡的话,那么,区分无政府状态和有政府状态,并不能给我们多少知识。”^{[10](89)}沃尔兹还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国家之间也会更重视相对获益而阻碍了合作,所以冲突和战争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沃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

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但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含义

的界定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它必将导致冲突与战争。它认为世界政治中缺少公共政府并不是指完全缺少组织,这使得国家在行为方面产生较为稳定的预期。虽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以武力解决冲突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其代价极高。因而,理性国家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协调与合作来解决冲突。可见,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这种状态是有秩序的。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大胆地提出了质疑。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究竟是哪种特性取决于行动者身份是敌人还是朋友。自助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际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1](383)}如果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以是他助,那么,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可见,权力政治也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他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1](41)}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文化分别对应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从而演绎三种不同的逻辑。

较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其一在于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给定的,而是由国家造就的,是国家之间在互动进程中建构的共有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温特并不否认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性,但他强调权力和利益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物质分配只有通过观念因素才起作用。无政府文化的不断演进构成了无政府状态的第三个特征。

宏观看来,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设的理论依据在于把国际政治与霍布斯式自然状态进行比较及其与国内政治进行比较,而其现实依据在于国际共同政府缺失的事实。这与新现实主义关注冲突,解释冲突的理论取向相一致。新自由主义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同时,给予国际合作更多

的关注。但它与新现实主义一样，把无政府状态作为给定因素，赋予其恒定性。而建构主义注重非物质因素，以演进眼界看待无政府社会的理论进化，更加强调社会建构和国际行为体的实践性。基于这个逻辑起点，“两新”对“安全困境”的变化和超越似乎缺乏一定的解释力，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为“安全困境”的超越提供可能性，似乎更具补充性和包容性。

但是，微观看来，笔者认为各学派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还有几处需要进一步比较分析，从而达到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是“自助”和“他助”的基点的问题。新现实主义假定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并认为它是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温特断言：“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11](383)}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温特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无政府状态”即“无政府文化”这一术语的：一层是中央政府的缺失，另一层是指中央政府缺失状态下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若单从温特理解的第一层面看，两者并没有任何矛盾，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就是在缺失政府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单位各自存在这样一种状态而已。由此可见，新现实主义的“自助”是由无政府状态的结构特征决定的，而建构主义的“自助”或者“他助”是由无政府状态之下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其次，是无政府状态这个“空容器”中的内容问题。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概念并不含有“中央政府缺失状态下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层含义，但并不代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就忽略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沃尔兹认为“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那么这种权力分配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行为体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被动的“互动”。所以，“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内容。”而无论是建构主义的基于观念的“主动的”互动，还是新现实主义基于物质的“被动的”互动，都构成其中“丰富的内容”。

新现实主义的由权力分配而引起的行为体间的“互动”同样可以解释结构的变化。这也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国际结构究竟是物质现象，还是观念现象。温特认为，国际结构是观念现象，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是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而产生认知后架构起来的。但是这种实践和认知又是基于什么？建构主义虽然强调并未忽视对这一点的认识，但在阐述上却轻描淡写。事实上，主体间的实践和由此产生的观念是依赖于物质现象，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基于权力的分配，至少在主体间互动的初始阶段是这样的。所以并不能单纯的说国际结构就是观念现象，这

容易夸大观念、认知的作用，而忽视物质、权力等问题。

对于无政府文化的理解应纳入到一个不断进化和演进的时空中去，这也是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所在。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两新”在强大的理论背景下，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中的不可动摇的合理成分，因为作为“安全困境”的逻辑起点，对无政府状态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安全困境”不同的逻辑推演。

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和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比较

（一）对安全的预期的差异

对安全的“预期”难免会使人想到建构主义理论中的“预期”，会认为这部分的论述会受到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甚至干脆纳入到建构主义的框架下去探讨，这样的探讨也势必会失去意义。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两新”还是建构主义，在承认了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后，基于对其的不同理解，必然会演绎到对安全利益的预期，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形成“安全困境”。

新现实主义对安全的预期就极其简单明了。它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就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也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安全困境”。在“安全困境”中，国家的安全既不能通过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也不能采取防御性合作来获得。最多也就是在恶化与缓解下不停地循环往复。这种以“安全”为目的，但又认为“安全”不可能实现的预期，就使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必然是以战争、权力等作为手段，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安全”的自助体系。

新自由主义虽然接受了新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但是却认为这种状态是有秩序的，各种国际组织和各种制度是这种秩序的具体体现，而且它认为国家不是追求自己的最大权力，而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它对安全的预期就没有新现实主义那样悲观，它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将导致冲突与竞争，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自由主义认为对安全的预期可以通过“囚徒困境”中的预期来解释，即“我方欺诈，对方合作，比双方合作处境好；双方合作比双方欺诈处境好；我方合作，对方欺诈处境最差”。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双方都选择欺诈的可能性极大，但一旦处于多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之中，那么对未来的关注可以促进合作，所以，新自由主义很重视国际制度，因为这可以促进合作，

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并减缓“安全困境”带来的冲突和竞争,但是却不能根除“安全困境”。

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则是较为灵活的,因为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文化就是由行为体通过互动实践,而产生某种认知再通过行为而架构起来的,而这其中的认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安全的预期,由于实践和认知的过程产生了预期,建构主义特别重视观念的作用,并强调客观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够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所以,对安全的预期也直接的决定了实现安全的路径,当主体间预期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做出最坏的估计,一旦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势必感到威胁,结果就是安全困境。从另一方面来说,安全共同体则是全然不同的社会性结构:行为体的共有知识使它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它们都相信可以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结果就是安全共同体^{[11](24)}。所以,各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性质和各个国家的身份认识不同,即产生的预期不同,追求安全的行为也不同,在这一问题上,建构主义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英国虽然有很多核武器,但美国不会认为英国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朝鲜虽然刚开始研制核武器,但美国认为这将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因此美国要求朝鲜必须消除核武器。”^{[11](24)}

由此可见,无论是“两新”还是建构主义,它们从“安全困境”的逻辑起点一无政府状态出发,都必然会产生一种安全预期。这是“安全困境”从形成到超越的必然过程,也正是这种不同的预期,决定了行为体会相应采取不同的行为。比较而言,建构主义对安全产生的预期似乎更符合人民的意愿,因为它是安全困境的超越的一种逻辑前提。

但是,一种乐观的预期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的阻碍,而建构主义似乎忽略了这些客观因素,所以难免使其主观色彩太浓,若从国际关系的现状看,新自由主义对安全的预期似乎更与之相符,但是这也很可能成为建构主义乐观的预期的前奏。

(二) 主体的行为选择差异

对安全的预期的不同,必然导致主体的不同的行为选择。新现实主义对安全的悲观的预期决定了它的行为选择十分单一。新现实主义认为,安全是国家关注的中心,“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在重要关头,国家最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才是最高的目的。”所以国家总是从最坏处着眼,时刻提防对手,它认为,在国际体系中,除了第三方可能出于自利的考虑外,没有一种机制去

惩罚入侵者,即没有机会提供“安全”这一公共物品。因此,国家的生存只能靠自己,或者依靠联盟的形式来维系。所以,在行为选择上,国家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不断的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这是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最佳方式。即使走向战争也在所不惜,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自己成为体系的霸主,这种行为选择往往导致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

新自由主义由于把制度和合作引入到其行为选择中,所以在“如何追求安全”上二者有了分歧,但二者共同的悲观的安全预期,使其把国家利益简单理解为或者追求权力,或者追求安全,使得这种制度和合作带有服务性质。新现实主义认为,建立在军事权力和物质收益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内涵,这体现了新现实主义单纯的物质主义的内涵,而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制度的非物质性和观念性,但是其作用取决于制度可以提供的物质回报。物质性的权力和利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这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向新现实主义的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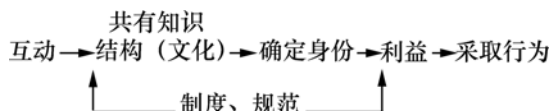
而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的情势是通过主体间行为互动,认知,身份确定等建构起来的,它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解构的可能,所以在“安全困境”形成的过程中,建构主义理论对于行为者的行为选择的论述更多体现在“互动——认知”这个过程上,认为行为体之间会通过实践进行互动,基于此会对他者产生某种认知,从而为他者确定一种身份,当确定他者是敌人时,必然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这样就往往形成安全困境。

单纯的研究安全困境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形成等是没有意义的,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是对“安全困境”的超越。虽然当前比较盛行的建构主义对于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些现象更显得有说服力,但笔者认为对“安全困境”超越构想决不能完全纳入到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对“两新”与建构主义的比较并非是想将其一分高下,而是想从中寻求各自的合理性,既与现实吻合又有可行性的闪光之处,从而能为真正意义上超越“安全困境”的理论构想尽微薄之力。

四、对“安全困境”的超越的思考

由于“两新”把“安全困境”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固有特征,它们用一种固定不变的视角去审视“安全困境”的状态,所以也必然会得出“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它们认为“安全困境”只能是循环往复,但却不可能根除,这只能把“安全困境”的超

越引入一条死胡同，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国际结构是通过主体间行为的互动而架构起来的论断，给“安全困境”的超越带来了可能，但或许是其主观性太浓而使其趋于理想化的原因，单纯依靠建构主义“重观念，轻物质”的理论，似乎不能得到真正的超越，因为在建构主义理论中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很多的障碍(其中有物质也有理念的)。



这是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建构的逻辑推演。若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安全困境”的超越,即实现安全共同体,同样要沿这条路径行走。在这一过程中,温特十分强调,通过共有的知识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同时在互动中建立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通过结构(文化)和规范二者共同来给行为者确立身份。其中他对结构身份的确立是十分重视的。虽然温特也并未忽视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但它认为物质性因素本身的意义却十分有限,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但笔者结合国际关系的现状,却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最为重要的,物质性因素在其中永远发挥第一性的作用。而这种“物质性因素”在现实中集中体现在经济交流上。目前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除了欧盟):合作的起点和目标的定位都不同;合作基本上处于一种由非制度性的经济联系的机制(贸易、投资)带动低水平合作的状态;各成员国之间结成的是一种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而且合作仍处于一种无组织且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要巩固和加强国家间的信任和合作,一定要实现低水平经济向高水平经济的过渡,弥补各国经济网络上利益的缺失点,从而增强国家间的凝聚力。

(新)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就是区域安全机制缺失,这实际就是要建立一种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制度,以制度性力量保障地区安全。新现实主义认为,社会规范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因果作用,在对行为的分析中可以不需考虑;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规范只在一些问题领域有作用,并帮助具有既定利益的行为体去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起到干预变量的作用;而建构主义认为,社会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为者的行为,而且还

建构了行为者的身份,使行为合法化,并定义了行为体的利益,由此而决定了行为者的行为。但是就国际关系的现状看,制度和规范还停留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解的层面上,所以国家间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则要经历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可以像建构主义设想的那样,从成员间彼此认同的规范制度开始,逐步过渡到有制约性和完善的区域安全机制。

在“安全困境”的超越上,我们现在可能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经济上的交流和制度上的建设。这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但同时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对“安全困境”概念的界定到“安全困境”的超越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从现实出发,用现实中的工具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它虽然并不是为寻求最终的超越而努力,但至少在某程度和某个阶段上,实现了安全的目的,获得了国家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在这个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国际社会,现实主义永远是第一位的,是最具解释力的。新自由主义对于“安全困境”的解释虽显得游刃有余,但由于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新现实主义之上,所以在逻辑推演上难免向现实主义妥协。但是,它在制度上的构想仍是其理论的闪光之处。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在“安全困境”的解释上更具灵活性,似乎更有解释力,但是这种解释力是因为它以一种观念上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思维的东西作为基础,而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建构主义对“安全困境”的剖析有些像一座空中花园,它缺乏物质的东西作基础,外表看上去虽华丽无比,但当真正解决问题时,才感觉到它的虚幻。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建构主义理论本身的基点就凌驾于“两新”之上,它不能回避“两新”的理论基础,但却偏偏以一种创新的姿态回避了它。对于“安全困境”的问题也是一样,“安全困境”本就是一种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物质现象,而建构主义对其的界定不过是在观念上对其的一种反馈,这也决定在“安全困境”的逃逸上,认同等观念上的因素会显得单薄。正如比尔·迈克斯威尼所言:“认同理论扩大了认同的因果性,不把利益的纬度作为学习过程的影响因素,就不可能解释认同的变化如何发生。设想被习惯和历史社会化的,具有特殊自我感的个人或集体,在没有自我利益刺激或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变化是理想化的。”所以,虽然认同等观念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国家利益来影响国家行为和区域合作,进而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但由于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仍然是以利益为基点的国家间和集团间的竞争,所以如果没有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决

定“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力量中,利益等物质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认同等观念因素是要以其为基础的。

“安全困境”的理论由来已久,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安全困境”都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将三者进行比较是想寻求各自其中的合理之处,并非是寻求一条中庸之路。通过这种理论上的挖掘,希望能找到一条最具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而对实现“安全困境”的超越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 [1]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 Edinburgh: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Robert Lieber. No Common Pow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 [3]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M]. London: Collins, 1951.
- [4]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 [5] John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6]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7] 肯尼斯·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 [8] Robert I. Roberg, Theodore K. Rabb. 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9]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0] 罗伯特·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4.

Comparison of security dilemma theory in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GUAN Jianing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opinions of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security dilemma are basically sam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dilemma is material or thinking phenomenon. Anarc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their same logic beginning.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ink the existence of anarchy decides that countries can not achieve the true security and escape from security dilemma, the main behaviour pursues the maximum of power. But constructivism thinks security and the behaviour of main body are decided by the degree of “interactivity-recognize” between main bodie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ink security dilemma is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 under anarchy. So the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security dilemma can not be avoided. I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forms through the interactivity and recognize between the main body, which takes the possibility of escaping from security dilemma, but it is so subjective that it inclines to idealization. To build of the true “security community” needs the balance of material power and interest and the influence of some thinking factors recognition is based on the balance.

Key words: security dilemma;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编辑: 颜关明]